

范成大出使金国所作诗艺术蠡测

景宏业

宋室南迁,成就了南宋一大批爱国诗人和词人,陆游、辛弃疾自不必说,即使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向来以田园诗著称的范成大,其“爱国诗也是不可忽视的,只不过由于他们的风格手法和陆游不同,表现得较为含蓄深婉,不象陆诗的豪迈劲直罢了”(周汝昌《范石湖集·前言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)。他的《合江亭》《题夫差庙》等爱国诗作,论者多以为慷慨沉痛,不可多得。尤其是宋孝宗乾道六年(1170年),他以“祈请国信使”出使金国时所写的一卷七言绝句(见《范石湖集》卷十二,以下简称“使金诗”),“感情深婉,回味无穷”(同上),更受后人重视。

使金诗凡七十二首,记载了他出使途中的所见、所闻和所感,诗中或痛惜中原的残破景象,或揭露金人落后而野蛮的民族压迫,或景仰古代抗敌报国的仁人志士,或谴责失地误国的统治集团,或反映北方遗民渴求恢复的愿望,或表达诗人爱国的深情以及尽节报国的决心,内容相当广泛。陆游当年曾称赞范成大大说:“其使虏而归也,尽能道其国礼仪、刑法、职官、宫室、城邑、制度,自幽蓟以出居庸、松亭关,并定襄、五元以抵灵武、朔方,古今战守离合,得失是非,一皆究见本末,口讲手画,委曲周悉,如言其国内事,虽虏耆老大人,知之不如是详也”(《渭南文集·筹边楼记》,见其书卷十八)。

而对这样一组“不论从内容讲或从艺术讲,都可称为杰作”(周汝昌《范石湖集·前言》)的重要作品,大多数文学史家只注意其“具有一定的史诗价值”(马积高、黄钧主编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第五章),很少有人从艺术的角度加以分析,本文试图从此方面稍加探讨。

一、抉精择要 删去繁芜

用七言绝句抒情,可谓言简意丰,音节浏亮,而若用其叙事,则由于篇幅的限制,就带来很大的不便。文学史上有诗史之称的诗人,深明此理,故用诗描述史实时,多选择篇幅不受限制的古体诗而绕开绝句这种短小的形式。范成大的使金诗,却有意识地选择了七绝来表现,这就增加了写作难度,决定了作者在下笔前必须来一番去芜存精、删繁就简的选择提炼,要求作者尽可能地将描写对象删汰浓缩,竭力将可有可无的东西去掉,将千言万语压缩在二十八字之中。

《州桥》是此类诗中最杰出的一首,诗云:“州桥南北是天街,父老年年等驾回。忍泪失声询使者:‘几时真有六军来?’”众所周知,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女真贵族,其社会制度

中还保留了若干落后的成分,他们的统治是相当严酷的,这不仅在史书里有许多记载,即使是在使金诗中也有迹可寻。范成大在《栾城》一诗题下自注道:“县极草草,伴使怒顿餐不精,欲榜县令,跪告移时方免。”诗曰:“颓垣破屋古城边,客传萧寒爨不烟。明府牙绯危受杖,栾城风物一凄然。”由诗及注可以看出,因战乱频仍,栾城县极为困顿,无力置办精美的饭菜招待客人,接待使便滥施淫威,县令几乎为此受皮肉之苦。以此观之,《州桥》中所写的北宋遗民,在如此暴政下,只能将渴望恢复之意“中心藏之”,而丝毫不敢形之于色,“断没有‘遗老’敢在金国‘南京’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臣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”(钱钟书《宋诗选注》)。比范成大出使略后三年的韩元吉,在其《书〈朔行日记〉后》一文中这样写道:“异时使者率畏风埃,避嫌疑,紧闭车内,一语不敢接,岂古之所谓‘觐国’者哉!故自渡淮,虽驻车乞浆,下马盥手,遇小儿妇女,率以言挑之,又使亲故之从行者反复私焉,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”(《南涧甲乙稿》卷十六)。

明白这些之后,我们再看《州桥》一诗,它的的确确写出了深藏在遗民心中的真正愿望,只是在动笔前,作者经过一番匠心别具的选择、提炼,突出了最能体现主题的部分,而将与这主题关系不大的、写出来又颇费笔墨的其它部分全部删去,从而保证了诗歌中心突出,不枝不蔓,用短小的篇幅,表达了一般作者非长篇巨制不能表达的内容。此正所谓以事实为基础而不拘泥于事实,不拘泥于事实却又不完全脱离事实,正确地处理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。钱钟书先生称赞说:“寥寥二十八个字里滤掉了渣滓,去掉了枝叶,干净直接的表白了他们的爱国心来激发家里人的爱国行动,我们读来觉得完全入情入理”(《宋诗选注》)。与此诗相类者在使金诗中还有《福胜寺》《相州》《翠楼》《内丘梨园》《光武庙》《真定舞》等等。清人陈许在《宋十五家诗选》中评论说:“范石湖取境雅瘦,力排丰缛;然气韵自腴,故高峭而不寒俭。”说的正是范诗的这个特点。

二、举重若轻 以小见大

北宋的灭亡,完全是因为皇帝昏庸,奸臣擅权。亡国君臣们的所作所为,有时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。史载金兵南侵初期,以重兵围太原,守城的王禀等爱国将领,带领全军民奋起反击,自春至秋,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,守城长达八个多月,宋王朝居然坐视不救,以致弹尽粮绝而城陷。又载金人越过丝毫未设防的黄河围攻汴京时,曾以嘲笑的口吻说道:宋朝若以一二千人守河,我辈岂能渡哉!

像此类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,是非曲直,决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,而范成大在《双庙》诗中,却用短短的四句,涉及了这类重大且又复杂的事件,诗曰:“平地孤城寇若林,两公犹解障妖氛。大梁襟带洪河险,谁遣神州陆地沉?”诗中虽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,但有意将唐代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城经年之久的张巡和许远,在没有任何天险可依凭的情况下,却在“平地孤城”中以极端悬殊的力量对抗十万虎狼之敌,与北宋君臣虽有险要的黄河可凭借,却不认真设防,致使金人长驱直入,国土沦亡的史实加以对比,巧妙地将读者的思维定势到神州陆沉、赵构君臣难辞其咎上来。因此又可以说,作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结合《李固渡》一诗来看,也许更容易说明白:“洪河万里界中州,倒卷银潢聒地流。列

弩燔梁那可渡?向来天数亦人谋!”四句诗,有对天险黄河画龙点睛的描绘,有对北宋君臣昏庸无能的谴责,也有对导致北宋灭亡之原因的深层次的探讨,而所有这一切,只用了一首绝句高度概括,可谓简洁、精练之极。

国破家亡,使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,挣扎在异族铁蹄的蹂躏之下,女真贵族以异常残酷、野蛮的统治方式来对待遗民,激起了民众的不断反抗,但孤立无援的反抗带来的只能是更为骇人听闻的迫害和压迫。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民,从精神到肉体上的痛苦是不难想象的。祸莫大于亡国,悲莫甚于失家,如此之大的主题,范成大精心选择表现角度,在使金诗中,将遗民们的不幸多层次、多侧面地表现出来。“女僮流汗逐毡毳,云在淮乡有父兄。屠婢杀奴官不问,大书黥面罚犹轻。”(《清远店》)这是一个被剥夺了自由,不堪忍受其苦,曾经逃跑过的女奴。第一句写她汗流浹背地追赶着主人的毡毳,足见平时繁重的劳役和非人的待遇;第二句写了她的身世,被从淮乡虏掠而来,父兄虽在而无力解救她;三、四两句写了她精神上的痛苦:因逃跑未遂而被黥面,尽管如此,她还是为自己庆幸——未被杀死而侥幸活了下来。读此诗,使人不由得想起了范成大的《后催租行》,那个为交租已卖掉两个女儿,仍为自己“室中更有第三女,明年不怕催租苦”而宽慰的老农。这些运用欲擒故纵的手法,以故作轻松的口吻而道出的深沉痛切之情,比起用长篇巨制平铺直叙地娓娓道来,感染力尤显强烈。

《清远店》里所写的仅仅只是一个奴隶,《望都》一诗中则描写了大众生活的困苦:“荒寺疏钟解客鞍,由山东畔白烟寒。望都风土连唐县,翁媪排门带瘿看。”古寺荒凉,村舍萧条,人多患病,且此贫而多病的状况不仅望都一县,“相传县东接唐县,病瘿者甚众”(题下自注)前文所引《栾城》一诗,堂堂县令居然无力置办一顿宴席款待“国宾”,县民的生活便可想而知了。这种选准角度,以小见大;由点及面,推而广之;用短小的篇幅,纯朴的语言反映出重大主题的写作方法,给人以举重若轻之感,收到四两拨千斤的艺术效果。

三、用事贴切 以少胜多

以学问为诗,以才学为诗,是宋诗的特点,也是宋诗的缺陷。从积极的角度着眼,恰到好处地运用典故表达自己的某种情感,则能收到以少胜多的表达效果,并且还能传达出一些细微幽约的弦外之音、言外之意。在《呼沱河》一诗中,范成大写到:“闻道河神解造冰,曾扶阳九见中兴。如今烂被胡膻羶,不似沧浪可濯纓。”河神有灵,曾有助于汉光武帝,而今被异族的膻腥之气污染,远不如沧浪之水可供许由一类的高人濯其纓,洗其足。两联诗用了两个典故,传达出多重意蕴:赞河神之功、哀河神不幸、怨河神无力自拔,而最终表现的是与征服者不共戴天的仇恨。

《藺相如墓》中,范成大表白说:“玉节经行虏障深,马头酹酒奠疏林。兹行璧重身如叶,天日应临慕藺心。”藺相如当年舍生就死,负璧入秦;巧施妙计,以挫强秦;不辱使命,完璧归赵的壮举,与范成大此行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据岳珂《程史》卷四载:乾道六年,宋孝宗想收回河南陵寝之地,并决心废除使臣向金国皇帝跪拜受书这一耻辱性的礼仪,朝中大臣大多不敢奉命,范成大则慨然请行。于是,他“迁起居郎、假资政殿大学士、左太中大夫、醴泉观使兼侍读、丹阳郡开国公,为祈请使以行。上临遣之曰:‘朕以卿气宇不群,亲加选择,闻

外议汹汹,官属皆惮行,有诸?’范对曰:‘无故遣泛使,近于求衅,不执则戮。臣已立后,乃区处家事,为不还计,心甚安之。’玉色愀然曰:‘朕不败盟发兵,何至害卿?啗雪餐毡或有之,不欲明言,恐负卿耳。’范奏乞国书并载受书一节,弗许,遂行。”而金法严厉,决不许使臣于国书之外再提交私人书奏,因而朝野上下均以为范成大此行生还的机会微乎其微,在《会同馆》中,他也表示:“万里孤臣致命秋,此身何止一沔浮!提携汉节同生死,休问羝羊解乳不?”以汉代的苏武自励,做好了为国舍身的充分准备。

这类诗,由于恰当地使用了典故,从而收到了一般的叙述语言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,许多也许必须用千言万语才能交待清楚的事,范成大仅仅用绝句便传达出来,极大地增加了诗歌语言负载的信息量,使诗歌内容显得丰富、饱满、感人至深。

四、切直劲峭 沉痛深婉

“狐冢獾溪满路隅,行人犹作‘御园’呼。连昌尚有花临砌,断肠宜春寸草无!”这是使金诗中的《宜春苑》一诗,题下自注:“在旧宋门外,俗名‘东御园’”。汴京丽景门(即旧宋门)外的宜春苑,昔日是皇家禁苑,何等繁华,何等气派!而今满目凄凉,唯“颓垣荒草而已”(范成大《揽辔录》)。唐元稹曾写有《连昌宫词》,着重描写了安史之乱后,皇帝久不驾幸连昌宫,宫殿因年久而失修的荒凉,其景虽破败不堪,然旧貌依稀可见。而范成大所见到的宜春苑,竟连“彼黍离离”的景象也不可得,居然寸草皆无了。清人潘德舆在《养一斋诗话》中说《州桥》一诗,“沉痛不可多读”,达到了七言绝句诗的“至高之境”。其实,堪当这种评价的何止《州桥》一首!像“秃巾髻髻老扶车,茹痛含辛说乱华”(《相州》)的推车老人,以乡人韩琦相夸于人,痛斥时无英雄,遂使神州陆沉;“汗后鹅梨爽似冰,花身耐久老犹荣。园翁指似还三笑,曾共翁身见太平”(《内丘梨园》),为树,当然更为自己曾经见过太平岁月而自豪,言外之意,则为生活在当时的年轻人而感到悲哀。诸如此类,均割切沉痛,用意深婉。

使金诗中,还有一类诗,言激意悲,表现了与征服者誓不两立、不共戴天的愤慨,在《唐山》诗中,他对异族入侵者因避讳而将“尧山”改为“唐山”大为不满,激愤地写到:“勋唐遗德照清湾,百圣闻风不敢班。何物苦寒胡地鬼,二名优敢废尧山。”而面对着“城外有荷塘柳堤,颇清丽,不类河朔”的美景,在赞美其“万叠烟螺紫翠浮”的同时,却又叹息道“谁解登临管风物,枯荷老柳替人愁”(见《邢台驿》及题下自注)。算起来,《临洺镇》该是七十二首使金诗中基调最欢快的一首,作者写道:“竟日霜寒暮解围,融融桑柘染斜晖。北人争劝临洺酒,云有棚头得兔归。”但细味全诗,对少数民族款待客人时的这种粗放的风俗不以为然——这,大概该算是范成大悲愤之极时的宣泄了吧!

总之,七十二首使金诗,艺术造诣是多方面的,他将七言绝句所能使用的各种艺术手法发挥到了极致,在选材、立意、谋篇、遣词造句、用典用事等方面,均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。

(作者:景宏业 山西大学中文系 030006)

[责任编辑 马斗全]